
察合台汗国的外交与遣使实践初探^①

彭晓燕 著 邱轶皓 译 刘迎胜 审校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743 (2014) 02—0092—24

DOI: 10.3969/j.issn.1002-4743.2014.02.011

就我所知,察合台汗国送往其他国家的信札均未被保存下来。然而察合台汗国位于诸蒙古汗国的中心,且与邻国的关系往往很紧张,许多不同的史料也提及察合台汗国的使臣和信件,可见察合台汗国与其他蒙古汗国,以及诸如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鲁克算端、德里算端、教廷等同时代的政权,以及一些更小的地方势力——如也里(Herāt)的迦儿惕(Kart)王朝都有着外交联系。

这个初步的研究要讨论自1260年统一的大蒙古国瓦解,直至1347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期间——察合台汗国受窝阔台汗国海都支配的三十年(1271~1301年)也包括在内——察合台汗国的外交实践。^②在介绍有限的文书,或更准确地说,引用文书的文献后,这篇文章将集中讨论两个主要问题:其一,察合台汗国外交的作用和方式,其主要外交行动是派遣使臣;其二,现存察合台汗国公文记载中的形式和观念问题。

一、文书(或文书的佚失)

由于察合台汗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著作,故察合台外交通信的缺失并不出人意料。^③事实上,蒙古时期的许多外交信件都没能以其原始面貌保留下来[总体来说,伊斯兰史中期(950~1500年)的外交信件都是如此]。然而许多信件或者以副本的形式保留在叙事性文献中,作为正文的补充;或者以外交实践范例的形式收入公文汇编中,给后来的书记人员当模本。^④然而,要

① 特此感谢我的同事 Reuven Amitai 教授对本文一份初稿所提出的宝贵建议。除了将 *č* 改为 *ch* 外,本文中的蒙古语人名均采取经柯立夫(F. W. Cleaves)修订的田清波教士(Antoine Mostaert)的转写方案。[译者按:此文汉译得到了作者授权。Michal Biran(彭晓燕): *Diplomacy and Chancellery Practices in the Chaghataid Khanate: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riente Moderno*(《现代东方》), Vol. 88. 2008, pp. 369-393.]

② 关于这个时期察合台汗国的政治史,参看 Biran: 2009, pp. 46-66。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3~479页。

③ 参看 Biran: 1997, pp. 3-6。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28~45页。

④ Roemer: pp. 1241-1244; Busse: pp. 308-313; Pfeiffer: p. 167.

研究察合台汗国的外交信件，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使用这些经过改编的版本，尽管它们通常仅简述文件大意，而不重构其完整格式，也没有发信人和收信人的头衔和写作日期。

但我们的确掌握了一些由察合台君主或其官员撰写的文书（或文书残片），其中绝大部分是发现于新疆吐鲁番的蒙古语文书。策仁索德纳木（D. Cerensodnom）和陶伯（M. Taube）把这些文书汇编成册，附上德语译文，便于使用，同时也对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这批文献中有些超出了本论文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并且它们全都是汗国内部处理世俗事务（诸如：税收问题、法律判决和对僧侣的资助）的文件，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文书，但它们几乎就是汗国中有公文传统和专职人员的仅存凭证。且至少有四份吐鲁番文书是商讨配给使臣的驿传凭信（letter of safe conduct）的，它们也提供了有关察合台汗国日常外交活动的重要信息。^① 在这组文献中，我们还可以增补进一份察合台汗摩诃末·孛罗（Muḥammad Pulad，或作：Muḥammad b. Pulad，1342~1345年在位）统治期间签发的蒙古语令旨，该文书近年在敦煌出土，是官方对巡礼途中的喇嘛的保护文书；^② 以及一份以都哇汗（1282~1307年在位）名义豁免税收的回鹘语令旨。这两份文书最近都由松井太（Dai Matsui）教授刊布。^③

现在仅存的严格意义上送往察合台汗国的外交文书是教皇书信：包括教皇尼古拉斯四世于1289年7月13日致海都的书信；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于1329年11月2日致察合台汗燕只吉台（Eljigidei，1327~1330年在位）的书信；教皇本尼迪克十二世于1338年6月13日致察合台汗敞失（Changshi，1335~1337年在位）的书信（未知其已遭罢黜并被处死），并附有致敞失的基督教大臣客列思门（Carasmon）和月合乃（Johannan）的一封信。致燕只吉台的信解释道这是对察合台汗致教皇信件的回复，然而致教皇的信今已不存。^④ 虽然其中一些信件保存了关于蒙古时代中亚基督教命运的重要信息，但它们更多地与教皇而非察合台汗国在中亚的外交与遣使活动有关。

不过一幅关于察合台外交的确切的图景，可由仔细研读察合台的邻国或通信对象——主要是伊利汗国和元朝留下的文献资料而补缀起来。对察合台汗国外交信息相对完整的引用主要涉及两个事件：其一，1304年察合台汗都哇和元朝大汗之间的约和，此事导致了诸蒙古汗国之间广泛的约和。在汉文和穆斯林史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关于此次谈判的记述，而伊利汗国史家瓦萨甫

① Cerensodnom and M. Taube: pp. 165-192; 关于过境许可，参看 pp. 178-182。[译者按：新近刊布整理的，和察合台系诸王有关的汉文、蒙古文文书，还包括：李逸友编《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考古报告1）；吉田順一·チメドルジ（編）：《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書の研究》，雄山閣，2008；敖特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敦煌学博士文库）。]

② [译者按：该喇嘛名为“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gong ding gui si Dorji Kirešis Bal Sangbo）。最新的研究见松井太著；杨富学，刘宏梅译《东西察合台系诸王族与回鹘藏传佛教徒：再论敦煌出土察合台汗国蒙古文令旨》，《甘肃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③ 松井太（Dai Matsui）：2007A，pp. 157-176；松井太：2007B。感谢松井太教授将这两篇重要论文的复印本寄给我。[译者按：关于都哇汗令旨的研究，见松井太：《ドゥア時代のウイグル語免税特許状とその周辺》，弘前大学人文学部编《人文社会論叢·人文科学篇》，2008：19，第13~25页。中国学者关于这批回鹘语经济文书的研究成果，可参看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

④ 关于寄给海都的信件，参看 Lupprian: pp. 258-259；关于寄给察合台汗信件，参看 Golubovich: Vol. III, pp. 345-354；Vol. IV, p. 252；Moule: pp. 1-36, esp. 13-20, 30-35，其中包括了1338年信件的英译。我要感谢希伯来大学的 Yonathan Rubin 先生翻译了其余的信件。

则留下了都哇送达元廷的和平请求的长篇转述。^①

其二则是牙撒兀儿（死于1316年）的活动，他是1316年归顺伊利汗完者都的察合台系叛王，不过在完者都去世后反叛了其继承者不赛因，且最终在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联手剿灭下被杀。^② 这些文书与牙撒兀儿在呼罗珊的调防有关，对探讨伊利汗国的公文更有价值，值得进行专题研究，故在此仅简略涉及。牙撒兀儿的信主要由萨菲（Sayfi）的《也里编年史》摘引且远较其他文献为详，却难以作为察合台汗国公文的代表。它们不是在察合台汗的授权下编写的，其中绝大多数写作于牙撒兀儿臣服于伊利汗时期。此外，牙撒兀儿像伊利汗一样是穆斯林，且其努力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而当时在位的察合台汗则不是。他因而在信件中用《古兰经》中的经文和波斯诗歌作为修饰，这点和其他察合台汗平铺直叙的通信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这样，牙撒兀儿之乱仍揭示了许多关于其使团的信息，并提到一些察合台汗怯别（Kebek，1320~1327年在位）、迦儿惕王朝（Kartid）和伊利汗国之间的通信。^③

其他与外交活动有关的记载，可以从当时汉地、伊利汗国和马木鲁克埃及的文献中点滴收集起来。汉文史料虽然仅保留了察合台汗国通信中的只言片语，却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记载了14世纪头几十年（1304~1333年）察合台汗国的使团，也包括元朝派往海都和察合台汗处使节的传记。^④ 在伊利汗国编年史中，哈山尼（Qāshāni）的《完者都史》（*Tārīh-i Ūljāyū*）对包括察合台汗国在内的整个蒙古世界的外交活动记载极为丰富。马木鲁克编年史和官署指南也提供了部分中亚蒙古汗国与马木鲁克算端国之间模糊联系的线索（但并非以信件形式记载）。

在本文所探讨的时段，有一次外交活动与海都的兴起相关联（13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主要涉及伊利汗阿八哈（Abaqa，1265~1280年在位）和察合台汗八剌（Baraq，1266~1271年在位）之间的也里之战（1270年），或涉及忽必烈汗试图说服海都归顺元朝的尝试。13世纪70年代后期海都政权巩固后，直至1301年其去世（尽管正是在这个时期，海都和马木鲁克人之间建立了联系）^⑤ 只有极少数外交联系（但有多次侵袭行动）被记载下来。对察合台汗国的外交而言，记录得最翔实的时期是14世纪头几十年：自1304年的约和至14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战争与和平更迭频繁，直到1323年察合台汗国最终归顺元朝。^⑥ 著名的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图泰也在这个时期造访了察合台汗的宫廷（1333年）。^⑦ 而关于之后几十年间察合台汗国的外交（和历史）我们知之甚少，这主要是因为伊利汗国倾覆于1335年，而元朝末代君

① Waṣṣāf: 1852-3, pp. 452-454; 关于和约见 Biran: 1997, pp. 70-75。

② 关于牙撒兀儿见 Kempiners: Kazuhide: pp. 97-118。

③ 牙撒兀儿的信件特别参看 Ward: 1983, pp. 607-608（下文简称：Zafarnāma/Ward）；Sayfi: pp. 642-646; 659-664; 684-686; 怯别的信，Sayfi, p. 765ff。

④ 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史料是《元史》，另有文集作为补充，其中袁楠所著使节拜住的传记是最有价值的。《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至一九四二一所收的驿站官员所做记录也同样重要（宋濂《元史》，十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四库全书本。《永乐大典影印本》卷一九四二〇至一九四二一《经世大典·站赤》，中华书局，1960年。

⑤ 见下文。

⑥ 关于这个时期的前半段参看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339~353页。

⑦ Ibn Baṭṭūṭa: 1958-1994, Vol. III, pp. 539-592（下文简称：Ibn Baṭṭūṭa/Gibb）；Ibn Baṭṭūṭa: 1969, Vol. III, pp. 1-58。

主元顺帝（1333～1368）在位期间的《实录》（《元史》的基本资料）的缺失，意味着汉文编年史对察合台汗国使臣的记录突然中断了。

以上对文书的总结表明，比起外交文书本身而言，我们掌握更多的是关于察合台汗国外交功能的信息。

二、察合台汗国外交活动的功能和运作

（一）使者及其作用

同当时通行的惯例一样，察合台汗国的外交联系，是通过特使或使团（蒙古语：*ilčiyān*；阿拉伯语和波斯语：*rusūl*；波斯语：*fīristādahgān*；汉语：使）进行的。使节主要是由在位的汗派往其他统治者或其下属——特别是他们的戍边将领处的，有时也由汗位下诸王派出使节（但也并非绝对）。

察合台汗国的外交使节负有两项主要功能：政治性或礼仪性的。^① 政治性的使节以商讨联合、臣服或请求军事援助为首任。他们的另一个从未被官方承认的目的，则是在计划起兵之前进行侦察或至少是情报收集。^② 在战争期间，特使（虽然未必是外交官）被派去目标城市，建议其投降或商讨交换战俘。^③ 几乎所有见载于穆斯林文献的察合台汗国使臣，都负有务实的政治职能。^④ 察合台汗国不定期地、即根据需求，与元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白帐汗国交换这类使臣。有时也往下属的地方统治者，如也里的迦儿惕王朝或畏兀儿亦都护（在其归顺察合台汗国之前）处派出使团或接待他们的使团。

礼仪性的使节被派去致以敬意和表达友谊（或表示臣服），并推动国家间的贸易联系。与察合台汗国同时代的汉地和穆斯林世界的政权，将频繁地交换使节作为国家之间友谊的象征和同义词。^⑤

① 关于在蒙古兴起之前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信使所负有的相同功能，参看 Wright: pp. 103ff.

② 参看八剌在也里之战前夕派马思兀惕伯（即麻速忽——编者注）到阿八哈处（Waṣṣāf, p. 68）；忽必烈派铁连去海都处（《元史》卷一三四，第3247～3248页）；吉牙思丁·迦儿惕（Ġiyāṭ al-Dīn Kart）派往牙撒兀儿处的使节把在那里的见闻及时告诉了他（Sayfī, p. 648）。

③ Rašīd al-Dīn: 1998-9, Vol. III, p. 468（下文简称：Rašīd/Thackson）；《元史》卷一一八，第2925页；Sayfī, p. 402。

④ 这是因为自始至终，察合台汗国与其周边各国的关系都动荡不安。关于海都和察合台汗国的政治性使团，可参看对也里之战之前一段时期的记叙。Rašīd/Thackson, Vol. III, p. 519ff；都哇与元朝之间的和平谈判：参看 Waṣṣāf, pp. 452-454; 475-477; 《元史》卷一二八，第3136～3137页。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93页；1310～1320年间，也先不花和元朝、金帐汗国月即别汗之间的和平谈判，见 Qāšānī, pp. 145-146, 175, 203ff；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2～23页。怯别派往汉地和伊利汗国的使团，见《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元史》卷二八，第682页；Sayfī, p. 765ff；牙撒兀儿派往完者都和赛因处的使团，见 Sayfī, pp. 641-644, 659-664，也请参看前两则注文。

⑤ 关于元朝的情况，《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第4页；关于蒙古兴起之前汉地的情况，Wright: p. 100ff；有关伊利汗国的情况，见 Rašīd al-Dīn: 1971, p. 102（下文简称：Rašīd/Boyle）；Waṣṣāf, pp. 452-453；关于帖木儿朝的案例参看 Broadbridge: 2001, p. 258。

这些政权所派出的礼仪性使节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宣告新汗的继立和前任大汗的去世。^① 察合台汗国数次接待过此类使节，且在1304年之后，他们还向元朝发出过这类通告。^② 另外一部分礼仪性使节（有时也有政治性使节）是带有经济目的的：一部分来自于业已成为外交活动一个组成部分的交换贡礼（见下文），按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朝贡，使节同样也涉足贸易，其数额之大有时成了接待国的负担。^③ 蒙古帝国内部经济外交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保障诸王在其他蒙古汗国的封地岁入。^④ 13世纪60年代后期，在也里之战前夕，海都和八剌派马思兀惕伯（Mas'ūd Beg）去他们在伊利汗国的世系封地检查帐目。^⑤ 马思兀惕伯仓促而归，可能收齐了事先承诺的账目，也可能没有，察合台在伊利汗国的封地自此杳无消息。据纳坦齐（Naṭanzī）称“成吉思汗把属于术赤领地的花刺子模中的柯提（Kat）和希瓦（Khiva）给了察合台，……从那时起直至加齐（Ghāzī）算端（帖木儿）时，这两个地区的收入（māl）分毫不少地得以征收。”^⑥ 这说明察合台汗从金帐汗处接收过这类使团。也有可能是在都哇死后，元朝统治者试图从他们位于中亚的封地中追索岁入，但不清楚他们到底收到了没有。^⑦

大多数有记载的察合台汗国的礼仪性联系是和元朝进行的（在1304~1333年间）。^⑧ 然而伊本·白图泰关于察合台汗答儿麻失里（Tarmašrīn, 1331~1334年在位）写道“他的领土处在世上四位伟大的君主之间，他们的名字是中国君主、忻都君主、亦剌克君主和月即别君主（原文如此），他们全都赠其礼物并以很高的敬意和荣誉待他。”^⑨ 这表明，至少在伊本·白图泰所亲历的时期（1333），礼仪性使节携带着这位摩洛哥旅行家所提到的礼物，来往于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德里算端国之间。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德里算端国之间的礼仪关系很可能

-
- ① Qāshānī, p. 149（[元武宗]海山的使者前来告知其已继承元朝大统），p. 145（金帐汗月即别前来告知其继位）；关于马木鲁克方面参看 Baybars al-Manṣūrī: p. 209，哈刺温算端遣使通告其继位。
- ② Qāshānī, p. 149，《元史》卷三五，第789页；卷二二，第494页；卷二四，第550页，卷二七，第615页，卷三十，第680页，卷三五，第794页。
- ③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第14~17页；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342~343页。至少有一部分商业贸易是由私人操控的。
- ④ 关于分封的讨论可参看 Allsen: 2001A, pp. 172-190；同样也可参看帖木儿时代史家 Naṭanzī 的描述“成吉思汗（将国家）在其四子之间作了划分，他为每一子都在另三子的封地内指定了一些属地（mulk），以使信使可在属地间不间断穿梭。” Mu'īn al-Dīn Naṭanzī: p. 427. 引自 Allsen: 2001A, p. 184。
- ⑤ Rašīd/Thackson, Vol. III, p. 519；Rašīd al-Dīn: 1959, Vol. II, p. 745（下文简称：Rašīd/Karīmī）；Allsen: 2001A, p. 181。
- ⑥ Mu'īn al-Dīn Naṭanzī, p. 427，引自 Allsen: 2001A, p. 178。
- ⑦ 《元史》卷二二，第502页，卷一三五，第3283页。Allsen: 2001A, p. 178。海都在汉地的分地岁入在其叛乱期间为元朝政府所冻结，当其子察八儿（Chapar）于1310年归顺元朝后被转授给他。（Biran: 1997, p. 78）。
- ⑧ 《元史》卷二一，第462, 463, 466, 468页；卷二二，第478, 494, 599页；卷二四，第550, 551, 555页；卷二七，第615, 620页；卷二九，第640, 644, 648, 653, 658页，卷三十，第669, 670, 673, 680, 681, 620页；卷三五，第794页；卷三六，第800~801页。也请参看 H. Yule: 1967, Vol. II, book. 3, p. 89。
- ⑨ Ibn Baṭṭūṭah/Gibb, Vol. III, p. 556；关于与德里算端交换书信和礼物的记载见 p. 562。

是晚期才有的，应该是受到答儿麻失里皈依伊斯兰教的推动。^① 金帐汗国和中亚蒙古汗国的礼仪性联系看来要长的多，肇始自海都在位时期。^② 这些关系也有助于促成中亚蒙古汗国和马木鲁克的外交关系。

中亚蒙古汗国和马木鲁克之间的接触或许是始于政治性目的，但同样也可被归为礼仪性一类，尽管两者接触极少。有记载的第一个马木鲁克使团是由马木鲁克算端哈刺温（Qalāwūn，1279~1290年在位）在1281~1282年间派出的，任务是向其盟友通告继位，虽然也有传闻称第一次与海都的联系是在哈刺温的前任——算端拜巴儿思（Baybars，1260~1277年在位）统治时期。与其他已被证实的马木鲁克派往中亚蒙古汗国的使团一样，哈刺温派往海都处的使团，是和派往金帐汗国的使团一起派出的，该使团号召海都“支持他（哈刺温）的朋友并反对其敌人”。也就是支持金帐汗国并反对伊利汗国。^③ 虽然伊利汗编年史中时有金帐汗国、马木鲁克和中亚蒙古汗国之间可能存在同盟的传闻，^④ 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同盟被认真讨论过（更谈不上具体实施）。海都派遣了回访使团，1284年马木鲁克再次派出使者，不过双方的关系后来似乎降温了。^⑤ 而他们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似乎是贩卖中亚奴隶去充当马木鲁克而盈利。^⑥

有关察合台汗国和马木鲁克关系的记载则更为匮乏，虽然马木鲁克的公文档案承认了双方间存在联系。^⑦ 马木鲁克史料记载了1315年海都派去的使团，而此时去海都离世之时已久，其故地也已为察合台汗国和元朝所瓜分。真正派出这个使团的很可能是察合台汗国。这个使团被描述成带有大批男、女奴隶，这也许是察合台汗也先不花（Esen Boqa）为了与所谓元—伊利汗反对他的同盟相抗衡而巩固同盟关系所做的尝试。^⑧ 皈依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答儿麻失里和马木鲁克算端哈刺温之子纳昔儿·马黑麻（al-Nāṣir Muḥammad b. Qalāwūn，1293/4，1299~1309，1310~1341年在位）保持着友好关系，曾与其交换国书，甚至有记载称，前者曾在御驾巡礼（*mawḳib*）

① 有记载的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最后一次冲突发生于1326年哥疾宁；而察合台汗国军队于1329年入侵德里，身为其兄长任印度前线的代理人，答儿麻失里亲自参与这两次冲突。参看 Biran: 2002, p. 744; Raṣīd/Boyle, p. 26, 据其记载，海都定期向合赞派出使节。

② 关于金帐汗国和在中亚的蒙古人的关系，参看 Biran: 1997, pp. 63-67; Biran, “The Mongols in Central Asia” 相关各段落。

③ Baybars al-Manṣūrī: p. 206; Mufaḍḍal b. Abī al-Faḍāyil: 1919-28, pp. 631-632 (Vol. XX, p. 125-126) .

④ 例如，Qāṣānī, p. 212。

⑤ Ibn al-Furāt: Vol. VIII, p. 1; Baybars al-Manṣūrī: pp. 206, 239; Nuwayrī: Vol. XXVII, p. 376, 作者称，使者未再前来，他自710/1310年起没再听说关于海都的消息。

⑥ Baybars al-Manṣūrī: p. 262; Nuwayrī: Vol. XXVII, p. 376; Tizengauzen: p. 270. (摘录Şafadī的*al-Wāfi*一书的BM. 手稿, fol. 96R. 我未能在出版的上述Şafadī著作中找到这则信息)。

⑦ 乌马里（卒于1349年），很可能针对al-Nāṣir Muḥammad的统治，评论说写给察合台汗的信与写给伊利汗的信极为相似（al-Umarī: 1988, p. 70）。Ibn Nāẓir al-Ġayṣ（卒于1384年）所编的指导手册则完全忽略了察合台汗国，仅提及金帐汗国和伊利汗国这两个蒙古汗国（al-Ġayṣ: pp. 9-10）。Al-Qalqaṣandī（卒于1418年）提到了察合台汗国，并引用了帖木儿的几封信，他将帖木儿看成察合台诸汗的继承人。他关于先于帖木儿时期的信息，则完全采自乌马里书。（al-Qalqaṣandī: Vol. VII, pp. 328-329.）

⑧ Tizengauzen: p. 270; 关于也先不花尝试与马木鲁克联合一事参看 Qāṣānī: pp. 212-213。

时在头上缠上标志纳昔儿的旗帜。^①帖木儿在一封约于1399年送达马木鲁克算端巴儿忽黑(Barqūq)的信里称,纳昔儿·马黑麻在位期间马木鲁克与察合台汗国曾结成同盟,双方曾频繁地交换国书和使节,然而这种说法看来是极为夸大其词了。^②

教廷的使团同样也可以被归为礼仪性的——是为了探听或确认察合台汗礼遇或虐待定居其境内的基督徒,也包括敦促其信奉基督教。^③燕只吉台往教皇处派使团的初衷,被后者在信中诠释为大汗希望受保佑及聆听天主教信仰。^④

政治性使团通常较礼仪性使团——特别是那些带着大批商贸人员的使团——规模更小且行动更便捷,但两类使团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当察合台汗也先不花拘押了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臣拜住,并希望从后者那里探听到元—伊利汗国联手反对他的计划时,拜住辩解道他只是被派去(向伊利汗)“通岁时问礼,曷有他意”,也即表明他是礼仪性而非政治性的使节。^⑤

有些使节同时身负多重任务,如13世纪60年代后期八剌派马思兀惕伯去阿八哈处表示友好和效忠,也就是礼仪性的遣使;而如前所述,马思兀惕伯同时也负有经济任务。但马思兀惕伯的真正使命却是充当间谍,侦查伊利汗国境内阿八哈的军队和道路情况,因此他同时也具有政治功能。^⑥

(二) 使节的身份

史料中提及的大多数窝阔台系或察合台系的使节不是姓名不详,就是身份不明。然而,他们中不少人被指出是派遣者的亲戚:通常是女婿、兄弟、儿子或只是一般亲戚。^⑦此外不少其他使节被记述作或被考证出是诸王。^⑧除了直系亲属外,在被提及的诸王中,我考证出一位察合台

① Mufaḍḍal, 1919-28, Vol. XII, p. 389 (见 Blochet 的导论); Mufaḍḍal: 1973, pp. 63-64, 90, Blochet 解释道,这也许是一面丝质的、绣有纳昔儿(al-Nāṣir)名字的旗帜(sanjaq 或 a'lām),系在答儿麻失里的额头以用作臣服的象征,可能和阿拔思哈里发开罗有关(同前书)。木法匝儿(Mufaḍḍal)称(上页注③),海都也曾戴过拜巴儿思(1260~77年在位)和哈刺温的旗帜,此说法更为不可信。al-Ġazarī: Vol. III, pp. 751, 851, 922-923; 在马木鲁克史料中,答儿麻失里被描述成直到738/1337-8(al-Ġazarī)或741/1340-1(Mufaḍḍal)年一直在位的(海都兀鲁思的)汗。同样也请参看乌马里关于答儿麻失里即位后,河中地区向马木鲁克商人开放的说法。(al-Umarī: 1968, p. 41.)

② Broadbridge: 2001, pp. 260-261; Anne F. Broadbridge: 2008, p. 179. 尽管马木鲁克编年史兢兢业业地记录了许多外国使团,我没能找到一则关于察合台汗国使团的记载,虽然编年史里提到过与察合台汗国交换国书。

③ 参看第2页注释④。

④ Golubovich, Vol. III, p. 355.

⑤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第22页。

⑥ Waṣṣāf, p. 70;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2. 关于元—伊利汗国间使团的多重职责,可参看 Allsen: 2001B, p. 34.

⑦ 例如《元史》卷二一,第466页,都哇的妻舅充当前往元廷的使节; Qāṣānī, p. 149, 怯别派其妻舅前往元廷。p. 214, 牙撒兀儿的女婿被派往伊利汗国;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32, 八剌派其兄弟充当赴海都处的使节;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0, Waṣṣāf, p. 68, 海都派遣其族人钦察作为往赴八剌处的使节。《元史》卷二一,第471页; 卷一一九,第2951页,都哇之子作为前往元廷的使节; 卷二九,第648页,怯别的族人充当前往元廷的使节; Ḥāfiẓ Ābrū: p. 112, (下文简称 Ābrū) 牙撒兀儿的族人充当赴伊利汗国的使节。

⑧ 例如《元史》卷三五,第789页。Sayfī, pp. 661, 667; Qāṣānī, pp. 32, 203, 215, 217. Zafarnāmah/Ward, p. 602; 上条注释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同样也属此类。

系、两位窝阔台系诸王和一位出自成吉思汗之弟拙赤·合撒儿 (Jochi Qasar) 家族的诸王, 同时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诸王属拖雷系。^① 其他察合台的使节包括将领 (amīr), 他们当中有些是察合台汗的怯薛,^② 以及宗教领袖: 1366 年牙撒兀儿派往伊利汗国的使团中有穆斯林学者,^③ 或在燕只吉台派往教廷的使团中有多明我教士。^④ 一个使团可能由同一类身份的使者组成 (即仅为诸王、异密或宗教领袖), 也可能由两到三类身份的使者组成。^⑤

这几类人中的后两种和当时的外交准则极为相符, 军队将领 (通常出自汗的怯薛) 也身列其他蒙古汗国 (也包括马木鲁克埃及) 的外交团队中, 至少在和伊利汗国、马木鲁克和金帐汗国的外交交往中通常由军事将领和穆斯林学者率团。^⑥ 在前往罗马教皇处的蒙古使团中基督徒也不罕见。^⑦ 然而察合台的使团中成吉思汗后裔贵族的数量之多, 不禁使人猜测察合台汗们之所以选择这些人, 是因为比起军队将领来他们更受信任, 或他们世袭其职的现象比其他汗国更多。不

- ① 八剌派往元朝戍边将领处的使节是八剌之兄卜思麻 (Buzma) 之子忽都鲁·帖木儿 (Qāshānī, p. 203), 此处将卜思麻讹作: Norma。以及《贵显世系》(Mu'izz al-ansāb), MS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A. F. Pers 67, fol. 31b, 窝阔台之子合丹·斡兀立 (Qada'an Oğul) 之子合丹·兀不克 (Qada'an Öbük) 之子刺忽里 (Lahauri), 以及窝阔台之子合丹之子哲别 (Yebe, [译者按: 汉译本作“耶耶”]) 之子兀鲁克·帖木儿 (Ürük Temür) 之子忽都鲁·火者 (Qutluğ Hwājah), 两者均充当了牙撒兀儿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节 (Qāshānī, p. 215, 217; Sayfī, p. 661; Rašīd/Thackston, p. 310.)。出自拙赤·合撒儿家族的也不干 (Abugan) 之子帖木儿是 1304 年都哇派往伊利汗处宣告和平的使节之一。(Qāshānī, p. 32, Waṣṣāf, p. 510.) 《武功纪》(Zafarnāmah/Ward, p. 602.) 提到牙撒兀儿派往完者都处的名为成帖木儿 (Chin Temür) 的诸王, 是后者的同族 (即拖雷系诸王)。
- ② 例如 Qāshānī, p. 32, 赶赴伊利汗国通告和平协定的察八儿的异密; p. 302, 扈从某位诸王前往元朝边将处的也先不花的将领。Rašīd/Thackston, vol. 1, p. 39, 海都遣往阿八哈汗处的札刺亦儿部亦鲁格 (Ilüge) 那颜。Sayfī, p. 667; Ābrū, p. 129, 派往伊利汗国的牙撒兀儿的异密等等。马思兀惕伯身着“成吉思汗散班常服”(Rašīd/Thackston, vol. 3, p. 519), 同样也可被看作是怯薛 (同书第 529 页这样描述他) —— [译者按: 这段文字汉译本《史集》中阙略, 英译文为 dayguard, 据《秘史》第 191 节作“土儿合兀惕”, 旁译“散班”, 意指为白天值班的卫士。见余大钧, 周建奇汉译《史集》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第 106 页。] 也先不花的使节之一据说是必阁赤, 也就是汗的私人宿卫。那些“出自汗的亲族”(zumrat-i hušāndagān, Sayfī, p. 403, 牙撒兀儿的使节法合鲁丁, Fahr al-Dīn) 或其宫廷中的亲信 (Sayfī, p. 644, 牙撒兀儿遣往完者都处的特使) 也属于宿卫 (怯薛) 一类。参看 Charles Melville: p. 135-64, 特别是其中第 147 页。
- ③ Sayfī, p. 667, Ābrū, p. 129. 他们是不花刺和撒马儿干的大伊玛目之一满刺赛甫丁·兀思伯 (Mawlānā Sayf al-Dīn 'Ušba) 和满刺札马鲁丁·阿不·阿齐兹 (Mawlānā Gamāl al-Dīn 'Abd al-'Azīz)。
- ④ 例 Rayn: p. 366, 其中一位特使名叫曼克索拉的托马斯 (Thomas of Mancasola), 他是教廷任命的撒马儿干主教使团的成员。
- ⑤ 参看上页注释⑦、本页①~④, 牙撒兀儿派往不赛因处的使团包括了诸王、异密和军队高官。Sayfī, pp. 661-664, Ābrū, p. 129。
- ⑥ 参看 Melville: p. 147; Holt: pp. 128, 130; 又参看 Nuwayrī, Vol. XXXIII, pp. 28, 41, 60, 199, 231, 256, 259, 278, 305; 关于元朝使团请参看上文所举例证。
- ⑦ 譬如曾于 1287 年作为伊利汗阿鲁浑的特使抵达教廷的拉班·扫马 (Rabban Šawmā)。Jackson: p. 169。

过必须记住的一点就是许多诸王事实上也是察合台军队的指挥官（大概也属于其怯薛），^①那就是说他们同样也适合军队将领这个类型。我相信察合台汗喜欢派具有贵族身份的使者主要是为了让他们能在目的国受到更好的接待。^②

察合台的使者中成吉思汗后裔宗王的巨大数量也意味着使节多为蒙古族，也有使者已被证实为其他种族的人。^③

有关察合台汗的使者信息的匮乏使我们难以推定他们是否为职业的外交官团队，就如元朝、埃及的马木鲁克或金帐汗国的情况一样，把固定的使者数度派往同一个或同几个国家。^④至少在牙撒兀儿的案例中，他数次派同样的几名使节前往伊利汗国。^⑤

（三）使节的资质

在蒙古兴起前的中亚已经为使者的资质制定了高标准：11世纪后期的君王规范《福乐智慧》（*Qutadgu Bilig*）称“使节（*ilçi*）需是人中之杰，需才智、勇气兼备，因为神挑选其最优秀的仆人作为他的使者。”^⑥更具体来说，他应当是辞令和文翰方面的专家“使节必须是……善于解读言辞，以言辞见长：他必须对之有着透彻了解并知道言外之意……作为其才智的证明，他必须懂得如何起草各类文件，如何读、写以及倾听……使节的工作和修辞能力关系如此密切，若其言辞得体就能达到目标。”^⑦使节也被要求忠于其派遣者、自制、不贪杯、有教养：精通诗歌或者科学——如天文学或数学，以及相貌英俊——最后这条确保其能够在目的国受到良好对待。^⑧是否每一位（或某一位）使节都能符合上述理想模范是令人质疑的，但上文的描述表明，使者当是具有高等资质之人，且善辞令是对他们资质的主要要求。^⑨

这同样也适用于蒙古时代。口才雄辩是一个成功使节最重要的品质，其次则是智慧和忠诚可

① 按萨菲所述，怯别于1315年前后入侵伊利汗国时所率领的察合台汗国军，以及他于14世纪20年代派去协助伊利汗国歼灭牙撒兀儿的军队实为“诸王位下的军队”，Sayfi, pp. 632-633, 766; Rašid/Thackston, Vol. III, p. 600; Rašid/Karīmī, Vol. II, p. 858; 海都派去援助捏兀鲁思的军队中包括了诸王和异密。[译者按“诸王”指海都子撒儿班。见汉译本《史集》，第三卷，第251页。]

② 见下文要讨论的使节资格。另见 Sayfi, p. 669 (Ābrū, p. 131)，不赛因对牙撒兀儿的使节评价甚高，其中包括两位窝阔台系的宗王。

③ 如前述宗教领袖和马思兀惕伯。在其他的蒙古汗国同样也有不同种族出身的使节（见下文提到的大汗忽必烈派往海都的使节）。

④ 马木鲁克的使节如也的迷失（Aytamiš），他主持了14世纪20年代马木鲁克和伊利汗之间的和谈。（Amitai: pp. 369-371.）马木鲁克和金帐汗国之间的使节，可参看：Tizengauzen: 1884, pp. 270, 317, 318; 元朝则有同一位身份不明的欢赤两度被派往察合台汗国（怯别，《元史》卷三十，第673、681页。昔班被派往海都处至少三次，《元史》卷一三四，第3246页。四度被派往金帐汗国的铁连，《元史》卷一三四，第3248页。拜住在被察合台汗拘押之前曾数次被派往伊利汗国，后来又成了怯别派往元朝的使臣，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2~23页。

⑤ Sayfi, p. 661, 667.

⑥ Yusuf Khaṣṣ Ḥājiḥ: p. 125.

⑦ Yusuf Khaṣṣ Ḥājiḥ: pp. 125-127.

⑧ Yusuf Khaṣṣ Ḥājiḥ:

⑨ 参看 Sinor, p. 339.

靠。^①事实上，即便携带有书面文件（见下文），使节的口才和智慧通常也决定了其本人的命运，及其任务的成功与否。

勇气同样也是必须的，这是因为出使的路途艰难、气候恶劣。不过派往察合台汗国的使节或许仍较自彼处派出的为多。而虽然蒙古人具有外交豁免的观念，这点甚至也得到海都士兵的尊重，但外交豁免仍有其局限性。^②当忽必烈派往海都和金帐汗处的使节铁连通过海都的领地并与其士兵遭遇时，他对他们说“我为天子使，可以非礼犯之耶？”士兵们被震慑住了，于是没有伤害他。然而其副手此前遇上了同一批士兵，却因为不像他那样的能言善辩而被处死。^③一位前往并非友邦的使节（如政治性的使节）可能会遭到敌对大汗的拘押，有时达数年之久。如果他被指控充当间谍（如前所述，这通常是遣使活动的一部分），或惹大汗发怒，或恰逢接待国政治动向改变，就会有被处死的风险。^④此外，目的国或途经国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也会造成拘押使节或更坏的结局。因此当察合台汗国和元廷或伊利汗国的关系恶化时，他们通常就会封锁道路，拘押或骚扰来往使臣并没收其所带礼物。^⑤

选使的另一标准是要确保他在目的国受到良好接待。这意味着选取那些和对方君主具有私人关系者，或具有个人美誉或学术声誉者，将增大出使成功的机会。故当八剌在准备派兵报复13世纪60年代中期输给海都的一战时，海都选中了钦察为使前往八剌处议和。这不仅是因为钦察的口才或贵族血统，而主要是因为八剌和他之间有着牢靠的“友谊盟约”^⑥。牙撒兀儿选择穆斯林学者充当前往伊利汗国的使者，强调他和诸伊利汗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与当时是“异教徒”的察合台汗形成鲜明对比），也很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派多明我教士去教廷亦是如此。而八剌派遣由大汗委任的、卓有声望的官员马思兀惕伯去阿八哈处，同样也可能是希望借重其个人的威望，如前所述，这也是察合台汗国在其外交人员中广泛征用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的原因之一。

作为提高使团成功率的一个方面，私交的重要性在大汗派到海都处的使节中尤为显著：蒙哥派去的石天麟，是通晓多种语言的汉人，最初曾是窝阔台宿卫，后任断事官。^⑦忽必烈则选择了

- ① Sayfī, p. 304, 特别是 669 页。“使节是君王 (pādshāh) 的喉舌，特使则是他的良心。” Waṣṣāf, p. 452; Qāshānī, p. 212 《元史》卷一三四，第 3247 ~ 3248 页。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0.
- ② 关于内亚（包括蒙古兴起前的中亚）和蒙古的外交豁免观念参看 Sinor: pp. 339-348; Yusuf Khaṣṣ Ḥājib: p. 164.
- ③ 《元史》卷一三四，第 3248 页。
- ④ 例如《元史》卷一三三《暗伯传》，第 3237 页。Rašīd/Boyle, p. 150, 在选择支持忽必烈之后，阿鲁忽拘押且最终处死了阿里不哥的使节。《元史》卷一六三《石天麟传》，第 3619 页。海都拘押了蒙哥的使节达 28 年之久！
- ⑤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 22 ~ 23 页。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者拜住，为也先不花所拘。后者审讯他，令其跪于雪地并打开所携信件。后来怯别劝告担任已方使节的拜住不要前往元廷，因为察合台汗国的边将也许会伤害他。[译者按，袁楠原文作“王（也先不花）解颜曰‘吾欲遣汝诣上通好，何如？’公谢不能。时有不内附者梗于路，遂罢行，复以公往昔拘所。”故当时的察合台汗仍是也先不花，而拜住并未同意担任察合台汗的使节。] Qāshānī, p. 208; 关于也先不花拘押元朝和伊利汗国的使节，参看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p. 526-527; 关于八剌拘押忽必烈派往阿八哈处的使节，参看 Rašīd/Karīmī, Vol. II, p. 755。如前引拜住一事所示，遭拘押的使节有时能赢得下令扣押他的汗的好感。同样也可参看海都所拘蒙哥使节石天麟的例子，据称他和海都私交甚笃。《元史》卷一六三《石天麟传》，第 3619 页。
- ⑥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0; Rašīd/Karīmī, Vol. II, p. 747.
- ⑦ 《元史》卷一五三，第 3619 页。萧爨《勤斋集》，四库全书本，卷三，页 14a-b。

畏兀儿人昔班，其父曾为成吉思汗效力。昔班则是忽必烈怯薛宿卫成员，后来又成为元朝中书右丞，此外他还曾是海都之父的教师。昔班未能成功说服海都归顺元朝，但海都（不止一次地）宽恕了这位长者的性命，允许其返回汉地，这仅仅因为自己的父亲曾“受书”于他。^① 忽必烈稍后派往海都以及金帐汗处的使者是乃蛮人铁连，其父曾是拔都的王傅和宿卫成员。他之所以被选中主要是忽必烈在召见他后，为其辩才和智慧所打动。^② 当都哇的议和书首度传至元朝边将处时，后者不想错失议和的机会，连忙回派了一个和都哇家族联姻的人。^③ 当使臣被派往敌对君主处时，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显得尤为必要，反之，在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臣中就看不出这种情况。^④

（四）使臣的工作

使者是由大汗或诸王指派的。^⑤ 他们通常由一到三名使者率领（在牙撒兀儿的案例中甚至有五名），且有数名（五到十人）、数十或数百名人数不等的扈从伴随。^⑥ 这些使者带着给出使目的国君主（或其属臣）的信件，或仅捎带口信（见下文）。关于使者所携礼物，察合台汗们最常选择的礼物是各种动物：马（快马、西马、体格雄壮的马）、骆驼、豹、虎和猎隼；宝石（玉和红宝石尤为常见）；葡萄酒（主要送往汉地）；中国产丝绸袍服（送往伊利汗国）；兽皮、奴隶（主要送往伊利汗国和埃及，汉地则否）、帐幕，还有一些未经详细列述的“重礼”或特产。^⑦ 运送这些礼物（动物、奴隶）势必会影响使团的规模和行进速度。在紧急境况下派遣急使（*ilčiyān-i sarī al-siyar*），以确保迅速地传递信息。^⑧

使团通过驿站前进，即取北线行进，从塔里木盆地前往别失八里和紧挨着察合台—元朝边界的畏兀儿王廷所在地哈刺火州，抵达察合台汗国的都城阿力麻里。再从阿力麻里，一条干道通向北方，穿过伊犁河和楚河河谷抵达塔刺思（Talas）、讹打刺（Uṭrār）和毡的（Jand），再到金帐汗国。另一条路线往南走，途经拔汗那（Farghana）的安集延（Andijān）到喀什噶尔（Kash-

① 《元史》卷一三四，第3246页。

② 《元史》卷一三四，第3247~3248页。

③ 《元史》卷一一九，第2951页。[译者按：指月赤察儿之弟马兀合刺，史源见元明善《清河集》卷二《太师淇阳忠武王碑》：“笃娃之妻，我弟马兀合刺之妹也。宜遣报使，许其臣附。”]

④ 关于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臣，参看 Allsen: 2001B, pp. 25-44。

⑤ Qāshānī, p. 38. 哈山尼书提到铁穆耳合罕（元成宗）的哈敦（皇后不鲁罕）也派出过使者，我尚无例证表明察合台汗的皇后也这么做过。

⑥ 例如1268年左右，海都派钦察率五名骑士至八刺处（Waṣṣāf, p. 68），一说二百人（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0; Rašīd/Karīmī, Vol. II, p. 747.）。八刺的使团由十名骑兵伴随抵达也里（Sayfī, p. 315）；牙撒兀儿派往也里的使团则由至少三十人组成（Sayfī, p. 676）。14世纪10年代，元朝官员抱怨道察合台汗使团的规模超过了一百人（《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〇《经世大典·站赤》，第14页）。据载，元朝前往察合台汗处的使团由较少人组成（例，《元史》卷二二，第500页，当时海山汗[译者按：即元武宗]派了一位使节[译者按：名塔察儿]、九名随从去宽彻[Könchek, 1307~1308年在位]处）。该使节的传记也给人这种印象。

⑦ Qāshānī, pp. 203, 206; Sayfī, pp. 304, 644; Mīrḥwānd: Vol. 5, p. 476 《元史》卷二四，第550, 551, 555页，卷二七，第620页，卷二八，第628页，卷二九，第653页，卷三十，第669页，卷三五，第794页，卷三六，第800~801页。

⑧ Qāshānī, pp. 38, 210, 145; 亦可参看马思兀惕伯匆忙逃归八刺处一事，见前引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0。

gar), 再穿过河中地区直达伊利汗国, 然后西行或南行至印度。^① 使团持有从大汗处或主管长官那里获得的驿传凭信, 其中详载驿站官员所必须供给他们的驿马和食物配额。供应物还包括羊、酒和面粉。驿站的专属官员负责进行分配。^② 派出方负责使节在其境内的开销, 对于接收方也同样如此。^③ 但使团在前往其目的国途中所经过第三国境内的开销由谁承担则尚不清楚(例如, 元朝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节从察合台汗国过境, 后者是否承担其给养)。有时, 来自一个国家的使团会与前往同一目的地的别国使节同行。因此, 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 以及元朝的使节一同抵达完者都处诏告和平; 而有时即便在不甚重要的场合, 伊利汗和察合台汗的使节也一起前来元廷, 也许是因为他们行经同样的驿路, 或是出于安全考虑。^④

前往敌对国家的使节通常最先在靠近派出国国境的边将营帐中进行停留。有时戍边将领本身便是出使目的所在, 特别是对那些处理战术事务的政治性使团来说。^⑤ 不过通常戍边将领会接待使团, 与他们交谈, 如果判定其所负使命足够重要, 就会设宴招待他们并将其送往汗的斡耳朵。^⑥ 我找不到证据表明, 察合台汗派出的或派去他们那里的使团, 是由东道主的代表扈从前往宫廷的。^⑦ 当使团抵达斡耳朵时, 会为其安排住宿: 伊本·白图泰虽非官方使者, 也从大汗的主事官那里分得一块靠近清真寺的营地和一顶营帐。^⑧

大汗通常会为使团设宴, 其规模和铺张程度可能视使团的重要性而定。^⑨ 因此就要求使节饮酒有节: 伊利汗的使节阿必失哈(Abišqa)在也先不花边将的宴会上纵饮无度, 夸口称其手中握有“也先不花的秘密”, 他遂遭拘禁和审讯。而他未经证实的供词指称伊利汗国计划和元朝联手袭击察合台汗国, 导致了两国边境被封锁达数年。^⑩ 宴会同样也是呈献使团所携礼物的场合。礼物通常献给东道国统治者, 有时同样也会向其手下重臣们献上重礼: 因此当八刺的使团抵达伊利汗国时, 他们给在伊利汗阵营中的察合台系将领(译者按: 应为“宗王”)帖古迭儿带去了特别的礼物。^⑪

宴会一结束, 使节们被召集到汗跟前。然后他们转达所携信息并与汗对答。故即使使团带来了书面文件, 口头交流仍然重要并能影响国家间关系。因此察合台汗怯别在对大汗表示臣服, 且

- ①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第517页。又参看 Qāšānī, pp. 204-205, 也先不花曾在安集延扣押了元朝和伊利汗国的使节。更多细部研究参考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 ② Cerensodnom and Taube: pp. 178-182; 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 ③ 《永乐大典》, 卷一九四二〇, 第16~17页。
- ④ 《永乐大典》, 卷一九四二一, 第2页。
- ⑤ Qāšānī, pp. 37, 206.
- ⑥ 例如, Qāšānī, p. 33, 203-204 《元史》卷一一九, 第2951页, 卷一二八, 第3136~3137页;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3; Ābrū, p. 112,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第22~23页。
- ⑦ Broadbridge: 2001, pp. 23-28; 关于马木鲁克算端国有派人陪同来自敌对国使团的习惯, 见 Broadbridge: 2008, p. 20。
- ⑧ Ibn Baṭṭūṭah/Gibb, Vol. III, p. 555 (Ibn Baṭṭūṭah, Vol. III, p. 30.) .
- ⑨ 例, Waṣṣāf, pp. 70, 475; Qāšānī, pp. 34, 37, 38, 40 《元史》卷一三四, 第3247页;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第23页。Sayfi, pp. 642-643; 通常宴会会持续三天。试比较 Broadbridge: 2001, pp. 25-28; Broadbridge: 2008, pp. 20-24 中关于马木鲁克接待来使的详细讨论。
- ⑩ Qāšānī, p. 205;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第22页。刘迎胜, “War and Peace”, pp. 344-345。
- ⑪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2; Rašīd/Karīmī, Vol. II, pp. 749-750.

接待了带来大汗认可其新继位为察合台汗的圣旨的拜住使团之后，称“来旨极善，使他人来，吾亦不若是深信。”这是因为“大较使臣多擅增减，致启边祸”^①。我注意到在这些场合从未提及有通事在场，不过这点丝毫也不令人吃惊，因为被记录下来绝大多数是各蒙古汗国之间交换的使团。^② 接受大汗会见，特别是当使者被要求解释当时派出国的政局发展时，也是展示使者口才和机智的场合。牙撒兀儿的使团带着牙撒兀儿的协约来到不赛因处，并对伊利汗吹捧了一番之后，不赛因正要把自己的协约交给他们，突然接到通报称，牙撒兀儿在呼罗珊杀害了一名伊利汗国的将领，他马上要求牙撒兀儿的使臣给予解释。使臣回复道，虽然此事在他出发后才发生，但他确信，牙撒兀儿此举唯一可能的理由是该将领藐视完者都汗授予牙撒兀儿在呼罗珊自治之权的令旨。不赛因对此回答甚为满意，称赞了这名使者并以协约函回复之。^③ 有时外交豁免权甚至能允许使节直斥大汗而无性命之虞。^④

使团在目的国一直呆到大汗允许其返回为止。^⑤ 逗留时间长短取决于使团所负使命和政治环境：通常约为数日至数周，^⑥ 但有元朝官员抱怨说夹杂在察合台礼仪性使团之中的商人有时在中国居留一至两年之久，目的仅是利用元朝接待之便做生意，^⑦ 而如果道路封闭或遭拘留也会使居留期延长。有时使团在返回之前还会接着造访其邻国：前往察合台汗国的马木鲁克使节首先会经过金帐汗国，元朝有时也会派同一支使团前往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金帐汗国。^⑧ 他们带回答复，有时是记录下的大汗口谕，^⑨ 以及礼物（多数为丝、金、银、衣服——包括荣誉袍），其数量多少反映出相关各国之间友好、臣服或敌对的程度。^⑩ 有时察合台汗派出自己的使者陪同外国使团返回，不过和马木鲁克算端国不同，这似乎并不是必需的程序。^⑪

一次行程因而长达数周、数月、一年以至数年，这取决于旅途的远近、政治局势和使团的使命。^⑫

-
- ①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引自刘迎胜《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元史论丛》，第五辑，1993，第46页。[译者按：作者将上述整句引文都理解成也先不花的话，今据汉文原意重新断句。]
- ② 蒙哥派往海都处的使者石天麟懂蒙古语，马思兀惕伯也一样。中亚居民中操多种语言意味着察合台汗国能容易地找到通晓多门语言的通事。
- ③ Sayfī, p. 669; Ābrū, pp. 123-132.
- ④ 铁连面斥海都之事，见《元史》卷一三四，第3247~3248页。遭拘留的使者向也先不花抱怨之事，Qāšānī, p. 205.
- ⑤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19, 521; Waṣṣāf, p. 70; Sayfī, p. 657.
- ⑥ Qāšānī, p. 207.
- ⑦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〇，第14~17页。
- ⑧ 《元史》卷三十，第673页；Baybars al-Manṣūrī: p. 206, 239.
- ⑨ Zafarnāmah/Ward, pp. 607-608.
- ⑩ 《元史》卷二九，第653页。怯别在表示臣服之后接受了数量至巨的赏钱（赐钞四万锭）。Sayfī, p. 645.《也里史志》称完者都汗在牙撒兀儿称臣后赐其大量礼物（*tašrifāt*）。赐袍服（海都皮服）见《元史》卷一三四《铁连传》，第3247~3248页；Sayfī, p. 766.
- ⑪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
- ⑫ 例如，马思兀惕伯在抵达后数日便匆忙离开阿八哈处，并于三夜后到达八刺大帐，这是因为他担心阿八哈的军队一旦看破其出使的真实目的，就会截留他。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19；试比较石天麟与拜住长达数年的出使；马木鲁克史料对察合台汗即位日期的记载滞后（见第7页注①）表明从中亚到埃及的旅程可长达数年。

三、形式和观念的问题

(一) 书面的还是口头的

如前所示,即便使节携带有书面信息,^①口头传达仍是使节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数量的使团据说带有文书,^②而在另一些场合,文献提及使团带有“信息”(peygām),这兼指口头或书面信息。^③对许多使团而言,没有迹象表明其携有书面信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不存在),^④偶尔编年史也会给人纯由口头传达的印象。^⑤在哈山尼关于都哇派往铁穆耳合罕(元成宗)的白描叙述中,信息“经由使节之口”(bi zabān-i ilchiyān)得以转达。^⑥

也里之战前夕,阿八哈试图说服八刺在其大军压境之前撤退,八刺的将领争辩说此消息不是来自阿八哈处,而是其边将伪造的,此事说明并没有“诸王令旨”以确保此消息的可信度。^⑦同样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塔刺思的忽勒勒台大会(1269年召开)或1304年蒙古诸汗国之间的约和遗有任何书面文件。这与伊利汗国和马木鲁克政权之间的约和、怯别汗于1323年表示臣服后收到的元朝合罕的圣旨构成鲜明对比。^⑧书面文件在怯别和牙撒兀儿时期(1315年之前)的史料中更为常见,但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不足以判定,是否有一个以口头传达为主向文书传递为主逐步转变的过程。

(二) 书面文件

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察合台汗国公文所用格式的主要文献是蒙古语文书,大都是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虽然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文书,但毫无疑问证实了文书的结构与行文方式中均运用了典型的公文惯例。^⑨

1. 这些公文包括特定的起首程式,续以文书正文以及结束程式。起首程式包括“授权”,即颁发文书是基于谁的权威——也就是察合台汗国的汗,标写其名而不具头衔。这类公文被称作“札里黑”(yarliġ/jrlj),即令旨(如Yisüntemür-ün jrlj-iy(a)r,“也孙帖木儿令旨根底”)。该授权仅出现在两份吐鲁番文书,以及一份敦煌出土的令旨上。^⑩

2. 发文人(Intitulatio): 实际发文人姓名(察合台汗国的汗或其位下官员),不带职名,并

① 所使用的术语包括: maktüb, nāmah, rislah(意均为“信”), farmān, yarliġh(圣旨、令旨),信(对应察合台汗而言);旨(对应元朝而言,见下文注释)。

② 关于马思兀惕伯将八刺的信带给阿八哈见: Waṣṣāf, p. 69; 牙撒兀儿的信件见: Sayfī, pp. 641-642, 645, 659-663, 674-676, 684; Zafarnāmah/Ward, pp. 607-608. Sayfī, p. 765, Qāšānī, p. 149,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提到致怯别的信件。

③ 见 Qāšānī, p. 33, 34, 37, 38 及其他。参看 Dihhūdā: Vol. IV, pp. 524-525。

④ 这包括所有元朝的礼仪性使团,马木鲁克使团及其他。见前注第5页注⑧,第6页注②、④。

⑤ Sayfī, p. 307, 315;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p. 520, 527; Qāšānī, p. 203 《元史》卷二一,第454、460页。

⑥ Qāšānī, p. 37.

⑦ Raš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7.

⑧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第23页; Amitai: pp. 367-371。

⑨ Cerensodnom and Taube: pp. 165-167; Weiers: pp. 13-14. 下文所讨论的术语引自策仁索德纳木和陶伯的论述。

⑩ Cerensodnom and Taube: no. 74, 68, 73(这份只是察合台汗的令旨); 松井太, 2007A, p. 159。

续以格式套语“üge manu”（蒙古语：言语俺底，例如：Kebeg üge manu；言语俺底：怯别）。^①绝大多数公文以此开始，也就是说没有“授权”部分。

3. 收文人和抬头 (*Publicatio and Inscriptio*)：该文书的呈送对象，通常是地方官员。

4. 正文由背景陈述 (*Narratio*) 和处置决定 (*Dispositio*) 组成。背景陈述即陈述导致发布令旨的事由，处置决定是对于此事件的命令或指导，通常以对胆敢违背者的制裁结束。

5. 文书的结束程式包括，a. 确认该公文的印信；b. 日期（年/月/日或日/月/年），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按照季节记录月份，如：一月春。根据朔望来记录日期（即属上半月或下半月）；c. 发文地点。^②

这些公文被用畏兀儿字母书写于纸上。它们有着共同的格式，松井太定义其为“察合台汗国式敬语文体”（Chaghadaid honorific style）。意即为了对文书首行的公文授权者（即察合台汗）表示尊敬，将随后的两行降格书写——即汗的名讳写于公文的右边最上端，而接下来的两行正文缩格书写。当上位的政府官员或尊者名讳（如 *ingri-*“天”，*qan-*“汗”，*oglan*“斡兀立〔诸王〕”）出现在正文中时，接下来的两到三行也要缩进。此外各行的开头则需与写有察合台汗名讳的第一行相持平，即和纸面右边持平。^③这个格式也体现在其他蒙古汗国的公文写作中。^④全部文书都经钤印（黑色或红色，红色被认为更重要）以示生效。^⑤绝大多数玺印上打有察合台家族的徽记（*ṭamǵa*）——由两个对称叶瓣组成，它同样也出现在从1310年代起察合台汗国铸造的钱币上（译者按——钱币上的察合台家族徽记作：𐰽）。该徽记曾被解释成象征被颠倒过来的藏文字母“cha”，这指的是汗国创立者察合台（Chaghadai）的名字。^⑥这看上去确有其道理，因为多位察合台汗对藏传佛教显示出好感，也和一些藏地喇嘛相识。^⑦徽记的使用没有宗教含义并在伊斯兰化之后得以延续，虽然至少在一个案例中，用阿拉伯语书写的“安拉”一词被刻在玺印上，位于徽记的上方。^⑧玺印和徽记的重要性同样也得到了伊本·白图泰游记的证实，据其

① Cerensodnom and Taube: no. 76, 又见: no. 68, 70, 73, 74, 84.

② 结束程式如下：“依此印（信）施行。蛇儿年夏末月下旬第二日，兀刺浑（Ulqun）里有时分写来。” Franke: 1977, p. 34, 文书原件及德译见 Cerensodnom and Taube: 1993, pp. 170-171; pp. 165-167, Weiers, 1967, pp. 13-14, 全面讨论了公文结构；松井太, 2007A, p. 158. [译者按：中国学者关于元代白话体公文的研究，还可参看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博士论文。]

③ Cerensodnom and Taube: pp. 165-167; Weiers: pp. 13-14; 松井太, 2007A, p. 158. 如果没有出现尊者名讳，则令旨格式如下：

授 权			背 景 陈 述	处 置 安 排	结 束 程 式
	发 文 人	收 文 人			

④ 松井太, 2007B, p. 4; Cerensodnom and Taube: p. 167; 伊利汗国的公文格式见 Herrmann: pp. 21-22.

⑤ Cerensodnom and Taube: p. 167.

⑥ Franke: 1962, pp. 405-407; 松井太, 2007A, p. 165; Weiers: pp. 31-34; Farquhar: p. 389. 他认为该符号是典型的汉字拼合，然而他没有解释为何其为察合台汗国所使用。

⑦ 松井太, 2007A, pp. 165-169; Biran: 2008, pp. 7-8: 26-43.

⑧ 此处所讨论的玺印（引自 Farquhar: p. 388）上有阿拉伯语的“安拉”字样、察合台的徽记以及用八思巴字书写的突厥语铭文“愿其国祚繁荣”，这反映出察合台汗国多语并用和同时受到东（八思巴字）、西方（安拉之名和阿拉伯文字）影响这一事实。察合台家族徽记和阿拉伯文字也同时出现在许多察合台汗国钱币上。

说“他们称玺印的保管者为‘*al-Ṭamgha*’: ‘*al*’意为红色而‘*ṭamgha*’意为‘徽记’”,他是立于大汗门口的四大异密之一。^①

察合台汗国公文的一个形式,可能也是较早的形式,出现于察合台汗都哇的令旨(“札里黑”)上,其纪年为“虎儿年”即1290或1302年。这份公文以回鹘语而非蒙古语书写。以“授权”开头(“都哇令旨 [*irlq* 即 *yarlig*] 根底”)且保留有大量典型的蒙古语公文结构(仅在结语部分作细微改变)。但其写作格式不同:仅突出大汗名讳和起文官员的名字,文本主体自始至终都缩格书写。而且其玺印上没有察合台家族徽记。^②该令旨遵循的是另一种公文传统,也许更接近当地的回鹘语公文的形式。松井太推测这一旧的形式反映了在此文书发出之时,察合台汗国仅控制了吐鲁番有限的地区,因此察合台汗国的公文规范并未在此地区通行。^③另一种解释是:既然这是我们所掌握的最早的文书,而在该令旨颁布年代,察合台汗国的公文规范尚未成型。

(三) 授权与臣服

在“授权”中使用“札里黑”一词值得更进一步的讨论。在蒙古语文书中,“札里黑”一词仅限于元朝合罕使用,而各地方诸汗、诸王和官员们则使用“*üge*”一词(译者按——蒙古语:“话、言语”)。上述资料中规格极高的文书——伊利汗致教廷或法兰西国王美菲力帛(Philip the Fair)的书信,仍使用公式套语“*üge manu*”(译者按——“言语俺底/我的话”)。^④从1312年前后,元朝边将脱火赤(Tugāgi,译者按——当为:Tugāchī)和察合台汗也先不花的使者商讨调整边界附近察合台牧地的一次谈话中可知,各汗国对用哪个词存有争议。在这场谈话中,当察合台汗的使节引述也先不花的“札里黑”时,脱火赤突然打断了他,并宣称仅有大汗,即元朝皇帝颁布的命令文书才能叫作“札里黑”。而其他由诸王颁布的命令文书只能被称作“令旨”(*līnkjī*)。使节反驳道“因为也先不花出自[成吉思汗]家族(*uruq*),对我们来说他就相当与合罕。”该回答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敌意。^⑤松井太解释说,虽然察合台汗们为了表示臣服于元朝而不使用“札里黑”一词,但其下属和官员们却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并认为其君主与元朝皇帝平起平坐。^⑥而无疑波斯语编年史(由承认元朝大汗权威的官员写成)在提及伊利汗和察合台

① Ibn Baṭṭūṭah/Gibb, vol. III, p. 558 (Arabic, Vol. III, p. 35) . 看来伊本·白图泰将徽记和玺印给弄混了。

② 松井太, 2007B, pp. 4-6. 该令旨格式如下(同样也需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见注111):

授权

发文人; 收文人; 背景陈述

陈述

处置安排

结束程式

③ 松井太, 2007B, pp. 4-6.

④ 参看 Mostaert and Cleaves: 1962, p. 470.

⑤ Qāshānī, p. 203, 引自刘迎胜《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第342页;松井太,2007A, p. 159. “令旨”一词在波斯语史料中,仅于此处被提及,这也增强了哈山尼记录的可信性。参看 G. Doerfer: vol. 4, p. 306.

⑥ 松井太, 2007A, p. 159; 另可参照的是,“札里黑”一词也常见于伊利汗国的行政文书中。(Herrmann: p. 67, 68, 73, 84, 90, 94, 162, 170, 173, 178)。也可参看乌马里关于伊利汗国在书写“札里黑”时要插入 *üge manu* 的突厥语对应词 *Sözü* (‘Umarī/Lech: 1968, p. 101, Lech 的注释见 p. 342ff; 又参考 Doerfer: vol. 3, pp. 242-246.)。

两边的令旨和书信时,^① 随意地使用“札里黑”(或其对应语: *farmān*)。因此, 尽管在都哇一例中, 他是否承认元朝的权威还颇有可疑, 但无法根据“授权”的起首语来判断察合台汗对元朝合罕服从的程度。至少在1323年以后, 察合台汗名义上承认元朝居其上位, 而这也广为当时的非蒙古人作家所知晓: 乌马里(‘Umarī, 卒于1349年)记述称, 各蒙古汗国承认元朝合罕的至高地位, 并在呈送给合罕的信件中将其名讳书于自己名字之前。^② 教廷在1289年和1338年两度用比称呼海都和敞失更高的头衔来称呼元朝皇帝。^③

(四) 头衔

对于察合台诸王在其信件中所使用的头衔我们知之甚少。^④ 文书中仅提及汗的名讳, 而这在编年史中也是惯例, 有时也在名讳前加上“诸王”(波斯语: *šāhzādah*, *pādšāhzādah*, 汉语: 诸王, 拉丁语: *principi*) 的名号。其他的称呼使用地理来定义: 教皇致燕只吉台的信件称“致呼罗珊、突厥斯坦和忻都斯坦的鞑靼人君主, 燕只吉台大人。”^⑤ 既然该信是对燕只吉台来信的回复, 故这也许反映出燕只吉台是如此称呼自己的。的确, 在教皇书信送出前后燕只吉台的代表宗王和兄弟答儿麻失里入侵了德里,^⑥ 且虽然呼罗珊始终在伊利汗国的控制下, 但察合台系诸王们仍将其视作世袭分地。^⑦ 然而因为该信写作年代前后, 教皇正向伊利汗国、中亚和印度派遣主教, 故此名称看来更能反映教皇传教活动的范围而非燕只吉台所有的疆域或头衔。^⑧ 1338年教皇致敞失汗的信件抬头为“中部帝国(Middle Empire)的鞑靼人君主, 尊贵的诸王敞失”, 该说法是指察合台汗国位于蒙古帝国中心, 仅在拉丁语文献中使用。^⑨ 汉文编年史有时使用“西域”这一地理概念, 但这包括起自察合台汗国以西的所有蒙古汗国。^⑩ 乌马里在其公文守则中将察合台汗国看做土兰(Turan)之一部, 该地名还包括了金帐汗国和元朝的国土。乌马里定义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为“哥疾宁、不花刺、撒马儿罕和全部河中地区的君主(*ṣāhib*)”^⑪。

而更为繁冗的头衔则见诸牙撒兀儿呈交给不赛因的协约函, 信中牙撒兀儿称自己作“全人类眼中的明光、成吉思汗后裔诸汗眼中的明光、伊斯兰的君王、牙撒兀儿汗, 愿安拉使其荣光永固, 所向克捷”^⑫。这个浮夸的称号结合了成吉思汗系和伊斯兰的正统性, 不仅和其他察合台汗

① Waṣṣāf, p. 71 (海都的“札里黑”); Sayfī, p. 314 (八刺的令旨), pp. 402-403 (都哇的“大札里黑”), p. 706 (怯别的令旨), p. 768 (击败牙撒兀儿的察合台系诸王的令旨), Qaṣānī, pp. 35-36 (察儿儿及诸王的令旨)。

② ‘Umarī/Lech: 1968, p. 26.

③ Lupprian: pp. 256, 258; Moule: pp. 15, 18.

④ 在刻下的研究工作中未曾得到充分开展, 对察合台钱币的分析将为该课题指破迷津。

⑤ Golybovitch: Vol. III, p. 351 (*Magnifico viro Elchigadan imperatori Tartarorum in Corossan et Truquestan ac Industan*) .

⑥ Biran: 2002, p. 744.

⑦ 参看 Sayfī, pp. 127-128; Rašīd/Boyle, pp. 189-190; Waṣṣāf, p. 69.

⑧ Golybovitch: Vol. III, p. 356, 以及教皇在1329年8月21日送出信件中的名称, 该信件在给燕只吉台致信前数月发出, 注明是交付给“居于燕只吉台(Elgigaday)治下, 及在呼罗珊(Chorasān)、突厥斯坦和小印度之忻都斯坦的全体基督徒”的(同上)。

⑨ Moule: p. 18.

⑩ 例如《元史》卷三五, 第789页。其中称答儿麻失里和伊利汗不赛因同为“西域王”。

⑪ ‘Umarī: 1988, pp. 69-70.

⑫ Sayfī, p. 659.

的称号形成鲜明对比（包括被称作“算端”的穆斯林汗^①），也和牙撒兀儿致伊利汗国将领或地方统治者的信中谦虚地自称“诸王牙撒兀儿”形成强烈反差。^②同样讽刺的是，尽管拥有这堆华丽头衔，牙撒兀儿却无法在呼罗珊落实其权威。事实是，这份协约函的格式与其他任何一份被征引的信件是如此的截然不同，不禁令人对其真实性大加起疑。^③

（五）正统观的公式语

在我们所有的察合台汗国文献中未曾包括其他蒙古高层外交文献（例如合罕致教皇的信件，或伊利汗致美菲力帛的信件）中所有的表示正统观的公式语。^④我们可以从编年史中引用的相对较长的信息中得以一窥其貌，虽则有时其真实性不可尽信。

“长生天气力里”在被引用的察合台汗相关信息中出现过两次：在1304年都哇的和平提议中，成吉思汗被描述为依靠“长生天气力”征服世界。^⑤1309年当怯别向铁穆耳合罕报告其废黜纳里豁阿（Naliqo‘a）汗时，他宣称是“凭着长生天（胡大）气力，合罕福荫”（*bi-quvati hudāy-i buzurg wa-dawlat-i qān*）做这件事的，^⑥这种措辞形成于大蒙古帝国时期，是蒙古人正统观之源。^⑦

在经过后世作者改编的、有关察合台汗国的信息中最常见的主题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团结。“成吉思汗征战一生，将世界上最丰饶的地区尽皆征服，目的是为了其子孙后代在和平和友爱中生活，因而他们也需尊重其意愿”这样一个观念在1269年海都向八剌提议和平及八剌在随后的塔刺思忽邻勒台大会上的讨论中，以及14世纪初诸王在向铁穆耳合罕（元成宗）递交和平倡议之前的聚会上均被提及。^⑧瓦萨甫关于1304年和平倡议的记述中，将此观点作了进一步发挥，并将之与成吉思汗的“札撒”联系起来。根据都哇和平倡议，“札撒”的主要要求就是，保持家族的团结并保证每一个家族成员从成吉思汗那里分到的（并经窝阔台批准的）所得，但家族内部的争斗使之成为一纸空文。^⑨甚而，这些内斗阻碍了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并可能成为王朝衰落的标志。这就像“大食算端的古老家族”（阿拔思王朝）时期那样，蒙古人之所以能征服他们，就是由于他们的内讧。^⑩在都哇致元朝合罕的通信中，拿阿拔思来做比喻看来相当不恰当（其中插入的波斯语诗歌也是如此），难免使我们对整个文本的可信度产生怀疑。

然而，瓦萨甫所征引的所谓铁穆耳合罕的回信中，合罕十分欣然地接受了都哇的和平请求，

① 参看 Biran: 2002, p. 745, 其中答儿麻失里的头衔 (*Sulṭān al-a‘ẓam*, 伟大的算端)。

② Sayfī, pp. 642, 645, 674 (世界的王子: *shāhzādah-i ġahān*), 684。

③ 这些疑点已为帖木儿朝史家哈菲兹·阿不鲁 (Ḥāfiẓ Ābrū) 所揭示。曾在其《史集续编》(*Dayl* 中大段地引用萨菲的著作的阿不鲁，在该协议书的一个简写版中略去了这些个头衔，并以“安拉最为清楚”来结束对该文献的讨论 (Ābrū: pp. 129-131)。

④ Allsen: 1991, pp. 223-241.

⑤ Waṣṣāf, p. 452.

⑥ Qāshānī, p. 149.

⑦ Allsen, 1991, p. 223.

⑧ Waṣṣāf, p. 68 (海都); Raṣīd/Thackston, Vol. III, p. 521 (八剌; 《元史》卷一一九, 第2951页。《道园学古录》卷二三, 第393页 (诸王聚会)。

⑨ Waṣṣāf, pp. 452-453.

⑩ Waṣṣāf, pp. 452-454.

称既然成吉思汗曾指定察合台来执行札撒，由其后裔都哇来致力于复兴札撒，并终止成吉思汗后裔中长久的敌意，再合适不过。^① 察合台和札撒之间的密切联系固已为众所周知。而有趣的是，“大札撒”也作为对胆敢违背令旨者的法律约束而为一份吐鲁番文献所提及。^②

牙撒兀儿的信函则保存了正统观念的另外一个方面，其中伊斯兰扮演了主导角色。作为穆斯林，牙撒兀儿试图（然而并不十分成功）最大程度地利用他与伊利汗国和呼罗珊地方民众共同的宗教。萨菲所引的他的信由一长段祷词开始，其中他赞颂真主，并引用主要与统治权相关的《古兰经》的章句和波斯诗歌（但未使用“以安拉之名”，*bi-smi allāh*）。^③ 在致地方统治者的信中，牙撒兀儿只字未提他的察合台家族出身，他的统治权基于完者都和不赛因授予他的权利，并基于他是一名好穆斯林。^④ 甚至在他呈交完者都的协约函中，牙撒兀儿也未提及其高贵出身，而主要是称颂完者都并表示臣服。^⑤ 另一方面在递交不赛因的协约函中，牙撒兀儿充分利用了成吉思汗和穆斯林两种正统性。如前所述，这在他给自己选的头衔和文件的落款中就已表露无遗。在一长串对完者都的华丽悼词之后，牙撒兀儿许诺以“不赛因之友为友、之敌为敌”，清楚表达了重修于好的意愿，结尾时他称以“无论何人违反此[联盟]之条款，就不是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家族成员，也不是安拉的使者——穆罕穆德宗教的追随者”^⑥。又一次深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牙撒兀儿很快破坏了联盟。无论牙撒兀儿信件的真实性的如何，它们的确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组合和不同的文书传统，它们的确反映了一种不同的观念表达和不同的文书传统，这种表达与传统显然是以波斯语写作并与呼罗珊地方惯例相近，^⑦ 也可能是保留了蒙古人兴起之前的样式。皈依伊斯兰教自然给蒙古人的正统观加入了新的因素，但看来牙撒兀儿比其他穆斯林蒙古统治者更多地强调这个层面，却并没能利用此层面达到其政治目标。在答儿麻失里的案例中，他的皈依可能加速了和同时代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外交和经济往来（后者很可能知道答儿麻失里与元朝的约和，因此察合台汗国的吸引力得以提升）。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有关答儿麻失里公文资料。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已伊斯兰化的察合台汗时期（秃黑鲁·帖木儿 [Tuğluq Temür, 1347 ~ 1363 年在位]，及其子亦里牙思·火者 [Ilyās Hwājah, 1363 ~ 1370 年在位]）写成的吐鲁番文书中严格地保留了和汗国伊斯兰化之前所编写文书的格式。^⑧

四、总结

研读和察合台汗国外交相关的史料，最为突出的印象是尽管存在着宗教、语言和种族的差异，但从汉地到埃及有一些共同的外交惯例，尤其是使团的功能和运作。察合台系诸汗参与了当

① Waṣṣāf, p. 454.

② Cerensodnom and Taube: p. 169.

③ *Zafarnāmah*/Ward, pp. 607-608; Sayfī, pp. 641-642; 644-646; 659-664; 674-676; 684-686.

④ 然而，也里君主即牙思丁·迦儿惕（Ghiyāṭ al-Dīn Kart）就曾向牙撒兀儿提起其家族成员的入侵：在牙撒兀儿之前，八刺和都哇曾在呼罗珊造成浩劫，Sayfī, p. 687.

⑤ *Zafarnāmah*/Ward, pp. 607-608.

⑥ Sayfī, p. 663.

⑦ 参看由萨菲征引的即牙思丁的信函。Sayfī, pp. 686-687.

⑧ Cerensodnom and Taube: pp. 168-170; 173-175; 176-178; 178-179.

时的外交活动，并拥有所需要的文书专业知识与专职人员，虽然相对于其所处的中心地理位置，他们在外交联系中所占的地位相形见绌。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本文考察的时段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和其他汗国关系紧张。这种关系也意味着察合台汗国的外交活动相对于其他汗国而言通常具有更强的政治功能，以及更加地务实。数目众多的成吉思汗后裔列身于察合台汗国外交使节中，是察合台汗国外交活动的另一个特点。

这篇论文只是在当时欧亚外交惯例的背景下考察察合台汗国外交活动的一个初步尝试，而这两者都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译者按：彭晓燕（M. Biran）教授，曾出版有《海都与中亚蒙古国家：窝阔台汗国的兴起》（1997）、《欧亚历史中的哈刺契丹》（2005），《成吉思汗：穆斯林世界的创造者》（2007），为《剑桥内亚史：成吉思汗时代》（第二卷）（2009）撰写了“中亚蒙古人政权”的章节，并正与金浩东教授共同主编《剑桥蒙古帝国史》系列，是近年来国际学界相当活跃的研究者。这篇论文对察合台汗国外交活动的功能和文献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塞诺（D. Sinor）讨论古代内亚外交实践的著名论文的姊妹篇。尤其是作者广泛讨论了不太为中国学者熟悉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文献，对拓宽国内蒙古史、中亚史研究的视野有着启发作用。爰为译介，以广其传。

在此亦要感谢希伯来大学杨巧博士对拙译稿的修正。

引用书目

Allsen, Th. T.

1991 《伊利汗国政治合法性形式的变迁》“Changing Forms of Legitimation in Mongol Iran”, *Rulers from the Steppes*, ed Gary Seaman and Daniel Marks, Los Angeles, Ethnographic Pre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1A 《共享帝国：蒙古统治下的土地分封》“Sharing out the Empire: Apportioned Land under the Mongols”, *Nomads in the Sedentary World*, ed. A. M. Khazanov and A. Wink,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1B 《蒙古统治下欧亚的文化交流与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Amitai, R.

2007 《蒙古—马木鲁克战事的终结》“The Resolution of the Mongol-Mamluk War”,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ed. R. Amitai & M. Biran, Leiden: Brill

Baybars al-Manṣūrī, Rukn al-Dīn

1998 《知识的精华：早期马木鲁克算端史》*Zubdat al-fikrah fī ta'riḥ al-hiḡrah*, *History of Early Mamluk Sultanate*, ed D. S. Richards (Bibliotheca Islamica, Vol. 42), Berlin and Beirut, al-Kitāb al-ʿarabī.

Biran, M.

1997 《海都和中亚独立蒙古汗国的兴起》*Qaidu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Mongol State in Central Asi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2002 《察合台汗与伊斯兰：答儿麻失里的皈依》“The Chaghadaids and Islam: the Con-

- version of Tarmashirin Khan”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 MXXII/4.
- 2008 《察合台汗国境内的文化和跨文化交流 (1220 - 1370) 》 “Culture and Cross-Cultural Contacts in the Chaghadaid Realm (1220 - 1370) ——Some Preliminary Notes” , *Chronika* (Seged) .
- 2009 《自成吉思汗征服至帖木儿兴起的 中亚: 窝阔台和察合台汗国》 “Central Asia from the Conquest of Chinggis Khan to the Rise of Temür: The Ögödeid and Chaghadaid Realms”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 P. B. Golden and N. Di. Cosmo (ed.) , Vol. II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adbridge , Anne F.
- 2001 《马木鲁克政权与蒙古和近东、中亚突厥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外交关系》 “Mamluk Ideologic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ongol and Turkic Rulers in the Near East and Central Asia (658-807/1260-1405) ” , Ph. D. Dissertati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 2008 《伊斯兰与蒙古世界中的王权和意识形态》 *Kingship and Ideology in the Islamic and Mongol World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Busse , H.
- 1965 《波斯的外交, 第三部分》 “Diplomatic iii. Persia” , *EP²* , II.
- Cerensodnom , D. and Taube , M.
- 1993 《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语文书》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 Berlin: Akademie Verlag.
- Doerfer , G.
- 1963-75 《新波斯语中的蒙古突厥语成分》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Dihhūdā , ‘A. A.
- 1971 《德胡达辞典》 *Lughāt-nāmāh* , Rpt. , Tehran.
- Farquhar , David M.
- 1966 《元代的印信和花押》 “Seals and Ciphers of the Yuan Dynasty” , *Monumenta Serica* , XXV.
- Franke , H.
- 1962 《关于吐鲁番出土蒙古语信件的年代》 “Zur Datierung der Mongolischen Schreiben aus Turfan” , *Oriens* , XV.
- 1977 《吐鲁番出土蒙古语残片 TM92 补注》 “Additional Remarks on the Mongolian Turfan Fragment TM 92” , *The Canada-Mongolia Review* , III.
- Golubovich , P. Girolamo
- 1906-27 《东方的方济会和圣地人物书目》 *Biblioteca Bio-bibliografica della Terra Santa e dell’Oriente Francese* , Quaracchi-Firenze , Collegio di San Bonaventura.
- Ḥāfiẓ Ābrū
- 1938 《史集续编》 *Dayl-i Ġāmi‘ al-tawārīḥ-i Rašīdī* , Tehran: Anīaman-i atār-i mallī.
- Herrmann , G.
- 2004 《蒙古时期波斯语文献》 *Persische Urkunden der Mongolenzeit* , Wiesbaden.
- Holt , P. M.
- 1986 《伊利汗阿合马派往哈刺温的使者们: 两份同时代的报告》 “The Ilkhan Aḥmad’s Embassies to Qalāwūn: Two Contemporary Account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XLIX.

Ibn Baṭṭūṭa

1958-1994 《伊本·白图泰的旅行》 *The Travels of Ibn Baṭṭūṭa* , trans. Hamilton A. R. Gibb , The Haklūt Society , Cambridge , Vol. III ,

1969 《伊本·白图泰旅行记》 *Voyages d'Ibn Batoutah* , ed. and trans. C. Defremery and B. R. Sanguinetti ,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

Ibn al-Furāt

1939 《伊本·傅刺惕史》 *Tā'riḥ al-duwal wa'l-mulūk (The History of Ibn Fūrāt)* , ed. C. K. Zurayk and N. 'Izz al-Dīn , Beirut ,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al-Ġayṣ , Ibn Nāẓir

1987 《术语解说之书》 *Kitāb tatqīf al-ḥaṣ'īf bi-l-muṣṭalaḥ al-ṣarīf* , ed. Rudolf Vesely , Cairo , al-Ma'had al-Ilmī al-Faransī li-l-Atār al-ṣarqīyyah bi-al-Qāhirah.

al-Ġazarī , Muḥammad b. Ibrāhīm

1998 《时代的大事纪》 *Tā'riḥ ḥawādīt al-zamān wa anbā' ihā wa wafayāt al-akābīr wa l-a'yān min abnā' ihā* , ed. 'U. 'A. Tadmūrī , Beirut and Saida , al-Maṭba'ah al-baṣariyyah.

Jackson , P.

2005 《蒙古与西方，1221-1410》 *The Mongols and the West 1221 - 1410* , Harlow: Longman.

Kazuhide , Kato

1991 《怯别与牙撒兀儿：察合台汗国的成立》 “Kebek and Yasawu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aghatai Khanate”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 XLIX.

Kempiners , R. G.

1985 《争夺呼罗珊：对14世纪前期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交流等方面的考察》 “*The Struggle for Khurāsān: Aspect of Political , Military and Socio-economic Interaction in the Early 8th /14th Century*” , Ph. D. Dissertati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u Yingsheng

2005 《元与察合台汗国的和战关系（1312-23）》 “War and Peace Betwee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Chaghdaid Khanate (1312-23)” , *Mongols ,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 ed. R. Amitai and M. Biran , Leiden: Brill.

Lupprian , Karl E.

1981 《从来往信件看13世纪教廷与伊斯兰、蒙古君主的关系》 *Die Beziehungen der Päpste zu Islamischen und Mongolischen Herrschern im. 13 Jahrhundert anhand ihres Briefwechsels* ,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Studi e Testi , 291) , Vatican City , no. 55.

Matsui , Dai

2007A 《敦煌发现的察合台汗国蒙古语令旨》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Chaghad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 ,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ogi Kudara* , ed. P. Zieme , Turnhout , Brepols.

2007B 《一份以都哇汗名义豁免赋税的回鹘语令旨》 “An Uighur Decree of Tax Exemption in the Name of Duwa [sic!] Khan” , the 3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African Studies held at Ankara , Sept.

Melville , Charles

2006 《伊利汗国的怯薛：皇室蒙古家庭的遗风》 “The kesig in Iran: the survival of the

- royal Mongol household” ,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 ed. Linda Komaroff , Leiden: Brill ,
- Mīrhwānd , Muḥammad b. Ḥwandshāh
1961 《洁净园》 *Tā rīkh-i rawḍat al-ṣafā* , Tehran: Payrūz.
- Mostaert , A. and W. Cleaves , F.
1962 《梵蒂冈秘档内的三份蒙古文书》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ètes Vaticans”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XV.
- Moule , A. C.
1917 《方济会僧侣在中国》 “The Minor Friars in China”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Mufaḍḍal b. Abī al-Faḍāyil
1919-28 《马木鲁克算端史》 *al-Nahḡ al-sadīd wa l-durr al-farīd fī mā ba’ dah ibn al-Amīd* (*Histoire des sultans mamlouks*) , ed. and trans. E. Blochet , (*Patrologia orientalis* , Vols. XII , XIV , XX) , Paris , Firmin Didot.
1973 《穆匝法儿编年史中 1317 - 1341 年间的埃及和叙利亚》 *Ägypten und Syrien Zwischen 1317 und 1341 in der Chronik des Mufaḍḍal b. Abī al-Faḍāyil* , ed. and trans. S. Kortantamer , (*Islamkundliche Untersuchungen* , Bd. XXIII) , Freiburg: Schwartz.
- Mu’īn al-Dīn Naṭanzī
1957 《木因历史选》 *Muntaḥab al-tawārīḥ-i Mu’īnī* (*Anonym d’Iskandar*) , ed. Jean Aubin , Tehran: Khayyam.
- al-Nuwayrī , Šihāb al-Dīn Aḥmad
1984 《文苑大全》 *Nihāyat al-arab fī funūn al-adab* , Vol. XXVII , ed. F. ‘Ašūr , Cairo , al-Ha’yah al-miṣriyyah al-āmmah li-l-kitāb.
- Pfeiffer , J.
2006 《阿合马·帖古迭儿致哈刺温的第二封信 (682/1283) 》 “Aḥmad Tegüder’s second Letter to Qalā’ūn (682/1283) ” ,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Post Mongol Central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in Honor of John E. Woods* , ed. J. Pfeiffer and S. A. Quinn , Wiesbaden: Harrassovitz.
- al-Qalqašandī , Aḥmad b. ‘Alī
1913-19 《书记的艺术》 *Šubḥ al-a’šā fī šinā’at al-inšā’* , Cairo , al-Maṭaba’ah al-amīriyyah.
- Qāšānī , Abū al-Qāsim ‘Abd Allāh b. ‘Alī
1969 《完者都史》 *Tārīḥ-i Ūljāytū* , ed. Mahin Hambly , Tehran: Bangāh-i tarjmaḥ wa nashr-i kitāb.
- Rašīd al-Dīn , Faḍlallāh Abū al-Ḥayr
1959 《史集》 *Ġāmi’ al-tawārīḥ* , ed. Bahman Karīmī , Tehran.
1971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 ed. and trans. John A. Boyle , New York and London.
1998-9 《史集》 *Jamī’ u t-tawarikh* [sic]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 trans. Wheeler M. Thackson ,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 4 Vols.
- Rayn , James D.
1998 《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传播: 14 世纪鞑靼人 “中央王国” 中的传教士先锋》 “Preach-

- ing Christianity along the Silk Route: Missionary Outposts in the Tatar ‘Middle Kingdom’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arly Moder History*, II.
- Roemer, H. R.
1971 《文书》“Insha”, *EF*, III.
- Sayfī, b. Muḥammad b. Ya‘qūb Harawī
1944 《也里史志》*Tā‘rīh-nāmah-i Harāt*, ed. Muḥammad Z. al-Ṣiddiqī, Calcutta, The Baptist Mission Press and the Imperial Library.
- Sinor, D.
1997 《中古内亚的外交实践》“Diplomatic Practic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Rpt. in idem, *Studies in Medieval Inner Asia*, Aldershot: Ashgate Variorum.
- Tizengauzen, V. G.
1884 《金帐汗国资料汇编》*Sbornik materialov, odnosjaščikhsia k istorii Zolotoi Ordy*, I, St. Petersburg.
- al-Umarī, Aḥmad b. Yaḥyā ibn Faḍlallāh
1968 《眼历诸国行记》*Das Monglische Weltreich: al-Umarī’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ālik al-abṣār fī mamāik al-amṣār*, ed. and trans. Klaus Lech (Asiatische Forschungen), Vol. XIV,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8 《术语解说》*al-Tā‘rīf bi-l-muṣṭalaḥ al-ṣarīf*, Beirut, Dār al-Kutub.
- Ward, L. J. (trans.)
1983 《穆思妥菲的〈武功纪〉》“*Zafarnāma of Mustawfi*”,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Waṣṣāf, ‘Abdallāh b. Faḍlallāh
1852-3 《瓦萨甫史(土地的分割与时代的推移)》*Tā‘rīh-i Waṣṣāf (Taḡziyat al-amṣār wa-taḡziyat al-a’sār)*, Rpt. Tehran, 1338S/1959-60 of facsimile ed. Bombay.
- Weiers, M.
1967 《出自察合台汗国的蒙古语驿站文书》“Mongolische Reisebegleitschreiben aus čaghtai”,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 Wright, D. C.
2005 《从战争到外交均势: 宋辽关系研究》*From War to Diplomatic Parity in Eleventh Century China: Sung’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Khitan Liao*, Leiden: Brill.
- Yule, H., ed.
1967 《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Rpt. Nendeln/Liechtenstein, Kraus Reprint Limited.
- Yusuf Khaṣṣ Ḥājib
1983 《福乐智慧》*Qutadgu Bilig*, R. Dankoff ed. and t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单位: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译者单位: 复旦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李文博

责任校对: 陈霞